

社會主義世界之變化與亞太情勢

畢英賢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國際共黨組召集人)

(本文係作者於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一(十五日)在日本東京參加第二屆「亞洲展望」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編者)

戈巴契夫 (M. S. Gorbachev) 在一九九〇年的新年文告中說，在過去一年中所發生的一切皆富有轉折性意義。①這些轉折性事件不僅在蘇聯境內一波接一波的發生，而且在東歐、甚至在整個社會主義世界皆出現了預料未及的巨變。蘇聯民主化過程加速進行，首次舉行真正的自由選舉，產生了擁有真正立法權的國會。去(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國大陸天安門屠殺事件固然震撼世人的靈魂，而東歐改革步伐之快、變動幅度之大，亦令人們訝異不已。

事實上，東歐改革的風潮是蘇聯改革的延長。由於蘇聯對東歐放鬆控制，允許東歐共黨國家有「選擇的自由」，②東歐共黨、政府與人民才敢大膽推動民主化，不虞蘇聯軍事干涉。最後，地處內陸的外蒙古也掀起民主化浪潮。

社會主義世界的巨變，使東方與西方關係以及整個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東歐民主化運動不但衝開了鐵幕，使象徵冷戰和歐洲分裂的柏林圍牆頃刻崩塌；而且使東西歐互動關係快速強化、東西德統一過程縮短、全歐統合運動擴大範圍。這些變化對亞太地區自然已發生、而且將繼續發生一定程度的影響。目前，這個影響不甚顯著，但將隨著局勢的發展而日益顯現。

本文擬檢視社會主義世界中蘇聯、中共與東歐近年來的改革及改革所帶來的變化，進而研析這些變化對我們居住的這個地區所產生的影響與變化。

註① 消息報 (Izvestiya)，一九九〇年一月一日，頁一。

註② 戈巴契夫 (M. S. Gorbachev)，「對聯合國國演說」，消息報，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八日，頁一—二。

蘇聯轉向「人道、民主的社會主義」

從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任蘇共總書記後，蘇聯的改造（Perestroika）即已開始。不過，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戈巴契夫才為他的改造提出了有系統的理论基礎。他坦誠地說，共產主義不是一個理想，而是社會本身的一個真正的運動。他說，蘇共以往沒有重視這個觀念，而力圖為未來描繪出一個理想的「模式」，然後按照這個模式改變社會，結果導致教條主義、意識形態僵硬、狹隘心懷、自我欺騙、對人民和歷史的暴虐。^④因此，戈巴契夫決心使社會主義有一個新面貌，也就是有一個人性的面貌。易言之，蘇聯改造的目標是建立一個「人道、民主的社會主義」。

按照戈巴契夫的設想，在經濟領域內必須發展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多種形式並創造新的經濟機制和法治政府，確保民權。以往，蘇共對「民主社會主義」一詞無好感，認為這是社會主義運動中改良主義與機會主義的表現。現在，蘇共不僅談論國家制度民主化，而且談論社會生活民主化。^⑤

一九八七年五月，蘇聯「個體勞動法」生效，^⑥蘇聯人民可以合法地從事個體經濟活動，其範圍包括家庭手工業、大眾生活服務及社會文化服務。同年六月，蘇共中央通過「關於根本改革經濟管理之任務」的決議。^⑦按照該決議，蘇聯每一個經濟層面都要進行根本的改革，其主要目標是，逐步從指令性經濟過渡到民主管理，並促進企業管理的自主性。六月底，通過「蘇聯國家企業（聯合公司）法」，^⑧作為蘇聯經濟改革的基礎。

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國家企業法」生效，蘇聯百分之六十的工業開始在完全經濟核算的基礎上運作，自籌資金、自負盈虧，政府對企業的成敗不負任何責任。各企業的管理全面民主化，自行選舉領袖。此外，蘇聯通過了「合作社法」，推廣生產和消費合作社；並開始實施把軍事工廠轉化為生產人民日用必需品工廠的計畫。在農業方面，蘇聯實施了土地長期租賃制，農民可終生擁有土地，且可優先轉租給其子女。

在政治方面，蘇聯連續採取多項措施以促進「民主化」，例如，徹底實踐集體領導原則，劃分黨政職能，精簡政府機構

註③ 戈巴契夫，「社會主義思想與革命性改造」，真理報（Pravda），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頁11。

註④ 同註③。

註⑤ 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頁1-3。

註⑥ 真理報，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頁1-5。

註⑦ 真理報，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頁1-4。

或改變其功能，修改選舉辦法，擴大黨內民主，以及在勞動集體內貫徹自治原則。在一九八九年內，戈巴契夫全力推行政治體制改革。蘇共把政治體制改革分三個階段實行。第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是改造蘇聯最高權力結構，選舉人民代表，召開全蘇人民代表大會。人代會選出新制最高蘇維埃作為常任專職國會；同時，人代會選出最高蘇維埃主席作為蘇聯的國家元首，其權力較之以往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大出甚多。第二階段的任務是調整蘇聯與各加盟共和國的關係；第三階段則是改革地方權力結構。第一階段的任務已大致完成；第二、三階段的任務正在實行中。

戈巴契夫說，一九八九年是蘇聯一九八五年四月開始改造以來的最困難的一年，經濟改革進行不易，消費市場情況惡化，首次出現了工人罷工，社會秩序失控，勞動紀律廢弛，民族關係尖銳化。因此，他認為在一九九〇年必須堅決地進行革命性改革。

一九九〇年二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了戈巴契夫所提出的新「黨綱」（草案）。該黨綱的目標是「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該黨綱草案將在七月初召開的蘇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上作最後決定。新黨綱的主要內容為：蘇聯改革的意義與理想是建設人道與民主的社會主義；一切政策以人民為中心；利用市場機制，亦即兼採計畫與市場經濟模式以規劃經濟活動；保障廣泛的社會主義民主和人民自由，容許多黨並存，建立總統制；重申列寧關於民族自決原則，成立新聯邦，調整民族關係。在國際關係上，蘇共重申和平發展的主張。⑧

質言之，蘇共的改革不是放棄社會主義，而是更新社會主義。蘇共在新「黨章」草案中明言，其任務是在蘇聯境內創造一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同時，強化國際主義與人類共同價值。⑨

東歐傾向「民主社會主義」

一九八九年四月，匈牙利國民會議決定，容許多黨制，揭開了東歐民主化的序幕。接著，波蘭共黨政府與團結工聯達成協議，容許團結工聯合法化，並定期舉行自由選舉。在六月大選中，波蘭團結工聯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兩個月之後，團結工聯領袖之一馬卓維契（T. Mazowiecki）奉波蘭總統雅魯塞斯基（W. Jaruzelski）之命，組織聯合政府，成為波蘭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第一個非共黨總理。

註⑧ 「蘇共中央綱領」，消息報，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三日（晚版），頁一一二。

註⑨ 「蘇共黨章」（草案），真理報，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八日，頁二。

另一方面，「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即匈共）於一九八九年十月，不僅更名為「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放棄了馬列主義；而且把「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改名為「匈牙利共和國」。九月初，由於匈牙利不再阻止東德人民路過匈牙利經奧地利前往西德，引發了東德的難民潮，令東柏林當局束手無策。次月，任東德共黨總書記已逾十八年的昂納克（E. Honecker）被迫黯然下臺，由克倫茲（E. Krenz）接任。他在人民大眾的壓力下，放鬆了邊界管制，敲破了柏林圍牆；同時進行改革。但是，他並未受到東德人民的擁戴。十二月底，東德共黨中央全會決議，放棄共黨專政地位。事實上，東德共黨在一九九〇年三月的大選中已經慘敗，以東德基督民主黨為主的保守聯盟獲勝。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保加利亞共黨總書記日夫可夫（T. Zhivkov）結束了三十五年的獨裁統治，由原任外交部長姆拉吉諾夫（P. Mladenov）繼任。次月，保共中央全會通過，放棄其在政府與社會中的領導地位，接受多黨民主體制的原則，恢復宗教自由。接著，捷克共黨總書記雅克斯（M. Jakes）被罷黜，由溫和派領袖烏班尼克（K. Urbanek）接任。十一月十日，捷克聯合政府成立；二十日，捷共召開緊急代表大會，廢除總書記職位，改稱主席，並選舉阿達麥茨（L. Adamec）為主席，反對派領袖哈維爾（V. Havel）當選總統。

一九八九年底，羅馬尼亞人民大眾要求改革，在迪米梭阿拉（Timisoara）地方舉行聲勢壯大的示威集會，羅共總書記齊奧賽斯庫（N. Ceausescu）下令血腥鎮壓；但執行鎮壓的軍隊和警察倒戈與民眾一起反抗暴政。齊氏夫婦倉皇逃遁，但終被逮捕，經秘密審判後處決。羅共領導階層組成「救國委員會」（The National Salvation Committee）充當臨時政府，立即實施民主改革，並決定在一九九〇年內舉行自由選舉。

總之，在一九八九年內，民主化像一陣狂風席捲了東歐，迫使東歐各國進行改革，各國改革過程或有不同之處，但追求的目標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簡單地說，在政治方面，東歐人民要求自由選舉，新聞自由，尊重人權，結束一黨專政，邁向多黨民主政治體系等。在經濟方面，他們要求放棄中央指令性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從理論觀點看，東歐各國正從國家社會主義向民主社會主義過渡。⑧易言之，東歐在短期內不會從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祇是利用一些資本主義的經濟機制去挽救社會主義，正如三十年代美國利用社會主義的若干措施紓解「資本主義的總危機」。⑨實際上，東歐國家要想把國有資產一下子轉變成私有，困難頗多。此外，東歐人民多年來已養成平均主義與集體主義。

註⑧ David Lane 定義，國家社會主義主要價值包括馬列主義，以及源自生產工具國有的特殊典章制度。參見其著作，*The Socialist Industrial*

Stat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6)，頁一四。

註⑨ 格魯列奧夫（Leo Gruliov），「『融合論』再臨」（“Convergence” Revised），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一九九〇年一月三日，頁一九。

義心態，短期內不易克服。^⑫任何震撼性的措施皆令人不滿，易導致不良的政治、經濟乃至心理後果。

在實踐上，匈牙利共產黨已改為「社會主義黨」，東德共產黨改為「民主社會主義黨」、波蘭共產黨改為「社會民主黨」，保加利亞共產黨改為「社會主義黨」；同時，在這些社會黨的新黨綱中，皆標榜「民主社會主義」。一般而言，民主社會主義者既反對蘇聯式的共產主義，也反對資本主義，他們主張通過民主手段建立自由的新社會。民主社會主義強調平等與自由，並努力通過有意識的和有指導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機器，把社會朝向這兩個理想演進。^⑬

中共奉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

一九七八年中共開始經濟改革時，並沒有一套成熟的理論為基礎。因此，實踐與理論發生了矛盾。一九八一年七月，中共召開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正式批判毛澤東思想，承認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處於「初級階段」。當時，這種說法祇是一個觀念，尚未形成理論。不過，這個觀點與鄧小平所說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頗相符合。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召開第十三屆黨代表大會，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報告中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⑭

按照趙紫陽的說法，中共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中共在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在這個階段內主要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與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階級鬥爭在一定範圍內還會長期存在，但是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為了解決現階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經濟，提高勞動生產力，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與技術現代化。

從一九八〇年起，中共曾多次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但是至一九八七年「十三大」時，才把推動政治改革的「總體設想」列為黨的三個主要任務之一。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措施就是，「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該措施包括六項內容：(一)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二)完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協調制度；(三)理順黨和政府同羣衆團體的關係；(四)健全選舉制度；(五)基層民主生活制度化；(六)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註⑫ 蓋瑞 (Adman Gare)，「福利社會主義與東歐集團：一個差勁的設置」(“Welfarism and Eastloc: A Poor Fit”)，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九〇年一月三日，頁一八。

註⑬ 拉狄士 (Giles Radice)，民主社會主義 (Democratic Socialism)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6)，頁一。

註⑭ 人民日報，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四日，頁一、四。

從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看，政治體制改革縱然一一付諸實施，也見不到民主化。正如趙紫陽本人在「十三大」報告中所說，政治體制改革的近期目標是有限的，有些可能幾年見效，有些可能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見效。趙紫陽進一步說，達到這個目標就能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奠定良好的基礎。¹⁵

因此，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與蘇聯的政治體制改革名同而實異。蘇聯的政治體制改革雖然不完善，但是其目標是民主化；且已宣布，實行多黨制。中共則不然，其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完善管理和加強控制。易言之，中共自始就沒有推行民主化的意願。從中共政治體制改革措施的內容看，可獲下列結論：(一)中共民主化尚是很久以後的事；(二)中共的作為祇是完善現有的「民主政治」，而非予以改革；(三)中共不會放棄專政，祇願與其他政黨協商；(四)中共明文規定，仍將依法制止人民「濫用」權利與自由。

中共不給予人民民主與自由，而爭取民主與自由的人民遭到血腥鎮壓。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中，中共向世界揭開了偽裝面罩。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雖然強調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但在政治上更趨保守。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中共公布「治理經濟三十九條」，其中特別指出：加強黨的領導，加強集中統一，加強組織紀律，反對分散主義。¹⁶這些顯然與民主原則背道而馳。

就在中共廣泛逮捕民主運動分子和加強內部控制的同時，東歐發生了劇變；甚至處於中蘇之間的外蒙古也被捲入民主的浪潮之中。對此，中共自然膽寒心驚，但表面上保持低調。後來，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不得不發表談話，試圖驅散中共頭頂上的烏雲。他說，東歐局勢不會對中共沒有影響，但也不會引起中共的關注。江澤民說，中共與東歐有五大區別：(一)黨的成長過程不同；(二)軍隊發展歷程不同；(三)國家成立的過程不同；(四)文化、傳統、歷史、地緣政治不同；(五)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情況不同。¹⁷因此，東歐的巨變不會在中國大陸發生。事實上，中共當局已更加警惕、更加嚴密地控制社會。

中共總理李鵬在七屆人大三次會議上，對一九八九年的工作作出三點總結：(一)制止了動亂和平息了反革命暴亂；(二)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就；(三)政治思想戰線出現了新的轉機。不過，他承認，大陸社會還存在不安因素。同時，他強調維護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大事。¹⁸

大陸社會不安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思想的。但是，其中最大的還是政治方面的不安因素。

註⑮ 同註⑭。

註⑯ 「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大公報（香港），一九九〇年一月十八日，頁四。

註⑰ 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頁二。

註⑱ 「李鵬總結去年工作」，大公報，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一日，頁二。

民運分子的潛伏發展，蓄勢待發，固令中共當局寢食難安；而中共高層的權力鬭爭，爾虞我詐，也令中共上層領導互不信任，相互掣肘。在鄧小平一息尚存之時，或可維持「團結」局面，但鄧小平一旦撒手歸西，情況就很難預料。

總之，中共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仍處在變化的過程之中。各個共黨政權變化的速度也許不同，但發展方向大致相同。中共正圖倒轉歷史巨輪，但早晚會被歷史巨輪碾壓而過。

亞太形勢的轉變

社會主義世界變化的同時，亞洲太平洋的形勢也在轉變之中。這種轉變是由多項因素所促成的。亞太地區豐富的資源與快速的經濟發展是基本因素，而社會主義世界變化所帶動的、整個國際形勢的急遽演變乃是非常重要的催化因素。八十年代中期，蘇聯為配合內部的改造而實行以「新政治思維」為基礎的對外政策。這一政策的實踐不僅使美、蘇關係及世界局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而蘇聯的新亞太政策也加速促進亞太地區形勢的轉變。另一方面，中共為了加速引進外資、技術與管理知識以利其經濟改革，而實行了對外開放政策。在八十年代內，中共對外開放的範圍不斷擴大，宣布開放沿海十四個城市，放鬆進口管制，鼓勵各省加強同外國經貿交流。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影響中共對亞太地區的各國關係。不過就影響的程度言，蘇聯的新亞太政策顯然大於中共的開放政策。

蘇聯新亞太政策的主要戰略目標包括：使蘇聯成為亞太大國，俾在亞太事務中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尋求經貿合作，以利其遠東與西伯利亞地區的開發；製造區域內國際壓力，迫使美國減少其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駐留；改善與該地區所有國家的關係，以增進其影響力；試圖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籌組亞太地區的「談判機制」，以解決該地區的安全與合作問題。

蘇聯新亞太政策的主要內容為，在言論上強調，蘇聯也是亞洲國家，但也承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強權地位。在外交上，蘇聯立意與所有亞太國家建立與維持友好關係，特別致力於改善與中共及日本的關係。在軍事方面，蘇聯承諾在遠東僅維持最低水平的防衛能力，不在該地區增加核子武器的部署，呼籲其他核子國家模倣；如果美國撤銷其在菲律賓的軍事基地，蘇聯願放棄金蘭灣「物資與技術」支援基地；計畫邀請有關國家，共商地區武器管制問題，特別是海軍的限制。在經濟方面，

註⑩ 蘇聯的新亞太政策大部分包含在戈巴契夫的兩次演說中，一次係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在海參崴(Владивосток)，另一次於一九八八年九月在西伯利亞的克拉斯諾雅爾斯克(Красноярск)。參見真理報，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頁一二二；及真理報，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八日，頁三。

蘇聯欲與亞太國家展開並發展廣泛的經濟和貿易關係。最後，蘇聯呼籲亞太國家舉行會議，就建立一個「談判機制」進行討論。按蘇聯的構想，這個談判機制將類似「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可稱之為「太平洋會議」或「亞太論壇」。

莫斯科為實行其新亞太政策，早已開始了實際行動。首先，蘇聯在亞太地區展開了前所未見的外交活動，與很多國家間的官方互訪甚為頻繁。僅以蘇聯外交部長謝瓦納澤（E. Shevardnadze）為例，他於一九八七年訪問東南亞五國及澳洲；一九八八年初，訪問紐西蘭、澳洲及南太平洋的斐濟；同年底，訪問日本。一九九〇年二月中旬，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N. Ryzhkov）曾訪問泰國、澳大利亞及新加坡。這是歷史上蘇聯政府首腦首次在這些國家進行訪問。

為爭取亞太地區人民對蘇聯的信任，戈巴契夫開始降低蘇聯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從一九八九年六月起在兩年內，蘇聯在其亞洲地區內片面裁減二十萬軍人；另外，蘇聯太平洋艦隊將裁減十六艘戰艦。^②蘇聯正把金蘭灣的米格機及長程轟炸機撤離金蘭灣；同時，蘇聯已減少在太平洋演習的規模。

莫斯科為開發遠東與西伯利亞經濟並發展與亞太地區經濟合作已草擬一個開發計畫，其總投資額達三千二百億美元。為配合此一計畫，蘇聯準備成立「自由經濟區」以吸收外資、現代科技、管理知識，並成立聯合企業。蘇聯已決定準備在近期內開放納霍德卡（Nakhodka）為自由經濟區，並預定在一九九一年開放海參崴。目前，在伯力及其他地方已經有二十多個聯合企業，投資者包括中共、南韓及日本等。^③蘇聯為了促進與亞太地區發展經貿、科技聯繫，於一九八八年六月成立了「蘇聯亞太經濟合作國家委員會」。

在改善對亞太地區各國的關係上，蘇聯努力不懈，且有顯著的成效。一九八九年五月，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訪問北平，中蘇共關係完成了正常化。一九九〇年四月，中共總理李鵬回訪，雙方一口氣簽署了六個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兩項是：（一）「中蘇兩國政府關於在中蘇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 and 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指導原則的協定」，（二）「中蘇兩國關於經濟、科學技術長期合作發展綱要」。^④改善對日本關係是蘇聯新亞太政策的另一個主要目標。由於北方領土問題，日蘇關係多年來難以有突破性的改善。戈巴契夫預定於一九九一年訪問日本。在此之前，蘇聯必然在領土問題尋求折衷的解決之道。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際政策委員會主席雅可夫列夫（A. Yakovlev）於訪問日本時表示，關於北方領土問題，可以找出第三種解決之道。^⑤一九九〇年四月，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彼德諾夫斯基（V. Petrovsky）在日本表示，蘇聯

註② 眞理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頁一一二。

註③ 斯奈德（D. Sneider），「豐富地區的大計畫：蘇聯遠東已成熟可摘」，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五日，頁一一二。

註④ 大公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五日，頁一。

準備與日本磋商，關於蘇聯從這些島嶼上撤軍的問題。^②一九八九年八月，第十二屆日蘇經濟合作委員會在莫斯科召開，促成今年一月日本前自民黨幹事長安倍訪蘇；戈巴契夫在國內事務如麻的時刻，抽空與安倍晤談，足見其改善對日本關係的強烈意願。^③

在朝鮮半島上，莫斯科不顧北韓的不滿，^④全力發展對漢城關係。目前，南韓與蘇聯經貿關係發展迅速，一九八九年雙方貿易額已達六億美元。今年三月，南韓在莫斯科成立領事處，去年蘇聯在漢城成立了類似的機構。同月下旬，南韓執政黨民主自由黨主席之一金泳三訪問莫斯科，並與蘇聯總統見面。金氏表示，漢城將在近期内與莫斯科建立外交關係。^⑤南韓已先後與匈牙利、波蘭、南斯拉夫等建交；對中共雖然也充滿同樣的熱情，但是中共反應比較冷淡。^⑥

在東南亞，蘇聯對外政策作出了極大的轉變。其注意力已從不發達的共黨盟國（如越南與柬埔寨等）轉向該地區經濟發展傾向資本主義的國家。今年二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訪問泰國、澳洲及新加坡這一事實尤其凸顯了這個傾向。蘇聯認為，東南亞無論在區域或國際的經濟與政治角色將越來越重要。關於澳洲所發起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蘇聯給予肯定的評價。^⑦當然，蘇聯極有興趣加入。對此，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持贊同的立場。^⑧事實上，新加坡是「東南亞國協」的六會員國家中，近年來與蘇聯關係發展最快速的一個國家。李光耀特別肯定，蘇聯的大幅度改造對國際局勢已發生積極的影響。^⑨在南太平洋，蘇聯照樣積極經營。蘇聯與澳、紐已建立正常的政治接觸，經貿關係漸獲改善。在其餘南太平洋島國中，蘇聯已與六個國家建立關係。此外，蘇聯公開表示，準備近期内與香港的經濟團體建立合作交流關係。^⑩

註③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頁六。

註④ 日本時報 (The Japan Times)，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一日，頁一。

註⑤ 真理報，一九九〇年一月十六日，頁一。

註⑥ 國際先鋒論壇報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一九九〇年四月七、八日，頁五；中國英文日報 (China News)，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一日，頁一。

註⑦ 中國英文日報，一九九〇年三月三十日，頁一。

註⑧ 中央日報，民國七十九年二月十七日，頁二；大公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日，頁二。

註⑨ 真理報，一九九〇年二月十八日，頁五。

註⑩ 真理報，一九九〇年二月十六日，頁六。

註⑪ 同註⑩。

註⑫ 大公報，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四日，頁一。

總的說來，蘇聯的改革對亞太形勢可能帶來根本的改變。蘇聯的改造與新思維不但在政治、經濟及文化等關係上有激勵作用，而對整個亞太地區的戰略佈局也有鬆動作用。中共的開放與改革政策自然也發生相當大而明顯的作用。至於東歐變局，亞太國家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一方面期待一個新市場的出現，一方面又擔心東歐將成爲一個新的競爭對手。不過，就目前情勢看，東歐與亞太尚未面臨短兵相接的態勢，因爲貿易在東歐各國的計畫經濟當中，並不是主要部分。

就戰略態勢發展趨向看，美國與蘇聯在亞太地區的兵力將逐漸裁減。由於蘇聯的片面裁軍，美國不得不採取相應措施。美國已宣布，將在三年內從亞洲撤回一萬五千名軍人（美國在該地區共有十三萬五千人）。^⑤美、蘇相互裁軍，一面使亞太地區戰略形勢趨向穩定，政治氣候維持緩和，有利區域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中共與日本的實力相對提升。未來，中共、日本與蘇聯在區域問題上，將扮演較大的角色，美國的影響力將相對減弱。

在未來亞太新的戰略形勢下，中華民國臺灣的戰略地位依然不可忽視，在若干特殊情況下，可能比以往更加重要。臺灣的戰略意義不僅僅在於其地緣戰略的重要性，而且在於其經濟上的重要性。中華民國是新興工業化國家之一，外匯存底達七百二十億美元。在區域經濟上的角色愈來愈重要，以外貿論，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額不斷增長；一九八九年該地區投資額急遽上升，總投資額達二億九千六百萬美元，較一九八八年增加四倍。^⑥中華民國境內政治民主化、經濟持續成長，是未來的理想的國際貿易中心；一九九七年香港淪入中共統治後，中華民國臺灣的地位將愈加重要。

結 論

由於社會主義世界的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所形成的、以冷戰爲基礎的國際政治體系已開始轉變。美、蘇兩極化的佈局已開始向多極化演變。經濟上的互賴關係將取代無理性的軍備競賽，國際關係上的意識形態因素已讓位於實質利益。在這個全球性的背景下，亞太地區的形勢也在蛻變之中，雖然其速度不及歐洲。

蘇聯的新亞太政策固然是促進亞太形勢轉變的基本因素之一，中共的改革與開放政策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作用。臺灣海峽兩岸關係的緩和使亞太地區的緊張氣氛逐漸消失，中蘇共關係的正常化亦有相同的效應。柬埔寨問題雖然尚未解決，但敵對意識已降低，朝鮮半島的緊張已不如往昔強烈。最反共的中華民國與南韓已與各共黨國家直接貿易，而南韓已與若干東歐

註⑤ 日本時報 (The Japan Times)，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一日，頁四。

註⑥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三十日，頁八。

政府建立外交關係。日本與蘇聯關係也不像往昔那麼僵硬，至少雙方都表達了改善關係的意願。毫無疑問，明年蘇聯總統戈巴契夫訪日之旅如果能成行，將使日蘇關係向前推進一大步。同時，也將標誌亞太新時代的開始。

亞太局勢正開始轉變，其轉變走向是否合乎全地區的最大利益，有待該地區各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在政治上，如何和平解決區域衝突；在經濟上，如何進行互惠合作；在文化科技上，如何促進交流。在在都需要一個共同的協商機制。因此，有必要成立一個「亞太協商與合作會議」（或 Asian-Pacific Consultation and Cooperation Conference; APCCC）。這個會議可由日本、美國、蘇聯、中共等發起。無論該組織的實質形態及功能如何，皆應該以下列諸原則為基礎：

- 該組織之宗旨應在尋求政治解決區域衝突之途徑、促進經濟合作、加強文化交流；
- 該組織不得排除區內任何國家或政治實體，除非自動放棄參與該組織之權利者；
- 該組織為協調實際利益而設，不得干預成員國或政治實體之內部事務；
- 凡有關地區事務之議案必須採取一致通過之原則；
- 該會議之下，可組成經濟合作、政治調整、文科交流等委員會；如因實際需要，並經大會一致通過，可設功能性實務機構。

不少歷史學者與政治家預言，二十一世紀是屬於亞太地區的。很自然地，亞太地區人民希望，這將是一個和平、安全與繁榮的世紀。因此，該地區的每一個政府，不論其政府體制及其基本理念如何，皆應朝此一方向努力；並為此放棄教條主義、霸權主義、壟斷主義、保護主義以及種族歧見等。

社會主義世界的變化，使亞太地區的發展有較美好的前景；如共黨政權能夠進一步邁向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多元化，則一個和平、安全和繁榮的亞太地區是可以期待的。

*

*

*